

「經解與變異」專輯導言

Preface: Commentaries on the Classics and Variations in Interpretation

林 啓 屏*

「經典」向來是人類文明的重要表徵，多數文明在建構的過程中，諸多的經驗會透過各種的紀錄與表現方式保留下來，進而成爲文明的代表，例如藝術創作、工藝作品、文字紀錄等。其中，以「文字」爲紀錄與表現方式下的「文本」，經常會在時間性的原初意義下，被視爲「經典」，並且成爲影響後來者的源頭活水。當然這些能成爲經典的文本，時間性的意義僅是其中的一個條件，通常文本能具有經典的地位與價值，還包括著所記錄的內容足以成爲此一文化區域後世各類價值系統與行爲模式的源頭，文本才可能爲「經典」。換句話說，作爲特殊時間點下的文本，亦需要在超越時間性的價值與意義上，方能夠顯現出其重要性，其經典性的地位，也才能真正確立。而且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這些經典所形成的價值判斷，尤其是根於普遍人性的理解，必須可以構成日後行爲者的規範來源，我們才更能說經典的神聖性地位於焉成立。因爲只有立基於人性的普遍性價值追求的祈嚮，方能構成人們永恆性的肯認，從而視之爲不可移易的「經典」。¹於是，此一經典世界，不僅是記錄

2017 年 5 月 23 日收稿，2017 年 5 月 24 日修訂完成，2017 年 5 月 24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Lin Chi-pi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Dean of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1 有關經典在時間性與普遍性意義的討論，請參拙著，《從古典到正典：中國古代儒學意識之形成》（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第十章〈正典的確立：學術與政

了時人面對世界、解釋世界的想法，也突出了時人改變世界的理想，是以其影響了中國歷代以來的知識分子心靈，也規範了他們行動實踐的方向。是故經典之所以為經典，需要有著普遍性、規範性與超時間性的意義。

中國文明的發展有其悠長的時間歷程，因此寫定流傳的「經典」文本，實觸及了許多古代心靈面對世界的各類經驗與觀察之道。事實上，中國文化的經典世界之形成，可以追溯到殷周之際，甚至更為久遠的年代。基本上，這個時期文字書寫的條件已經逐漸成熟，是以書寫紀錄的豐富性，使得文本的保存與流傳，達到新的境界。尤其，進入西周時代，各類技術的提昇，既改變了書寫的形式，也為經典的形成帶來了催生的動能。於是，從五經、六經到十三經，中國經典文本世界的形成，便在這漫長的歲月裡醞釀著，經典猶如壺中日月，順理成章地建立。一切看似靜好，實則經歷了歷代的許多紛擾與爭論，中國文化的經典世界才算確立。皮錫瑞面對這個經典的世界，就曾以孔子刪定六經為「經學開闢時代」的開始，其後經歷了「流傳、昌明、極盛、中衰、分立、統一、變古、積衰、復盛」等階段。² 皮錫瑞的說法是否合適？學界自有仁智之見。但是經典形成與流傳的過程，總不是平靜無波，「理解」與「詮釋」的衝突與差異，在強調神聖性的經典面前，令人不禁想問「真理」是唯一或是多元。

確實，「經典」的意義與價值，雖然透過文字書寫流傳，看似有其客觀不移的特性，可是意義與價值卻不是一成永成地定於一。從經典的流傳歷史來看，經典意義的理解與詮釋，其實充滿了諸多的爭議。尤其每一位詮釋經典的解讀者，在面對神聖的經典時，其立場是以虔信的態度，相信經典所記載的道理與指引的方向，解經者當不會將經典的解讀視為文字遊戲而已。這點在中國經學的發展史上，更是明顯。所以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歷代的解經者透過經典的文字記載，探索聖人之意，本即常態。但是，由此而來的詮釋經典之分歧亦是常態。此種分歧，原因甚多。但是具體的差異，經常是表現在對於「經典文本」的釋讀不同所致。事實上，「詮釋」活動必然牽涉到詮釋者、經典文本、作者等問題。而「經典」之作者更由於正典化過程，被賦予了神

治之間的「石渠議奏」)，頁 374-388。

2 皮錫瑞，《經學歷史》（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

聖的位階。因此，神聖作者如何藉由經典文本表現他對終極真理的掌握？經典文本如何適切地透過文字載體傳達真理？詮釋者又如何經由經典文字體會聖人之意？原初之意是否便即是已經圓滿的聖人之意？解經者有無理想讀者或合格讀者之要求？凡此種種，構成了經典詮釋的諸多難題。³

黃俊傑在處理中國經典詮釋問題時，相當敏銳地注意到經典詮釋的「語言性」(linguisticity)，與解經者的「歷史性」下的「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兩個面向在詮釋過程的複雜關係，以及其重要性。⁴這是個有趣的觀察視角，因為前者所指的「語言性」涉及經典文本文字脈絡的理解；後者則關乎經典作者與解經者的主體性，如何介入文本之釋讀。這兩端構成了經典詮釋活動的要素，不可偏廢。其實此處所論的兩端，的確是理解中國經典詮釋課題需要深入思考的面向。我們知道中國經學在漫長的時間發展下，有著驚人的龐大遺產，此即是由「經、傳、注、疏」所構成的經典詮釋世界，而這也才是我們一般所熟悉的經學世界。在此之中，「經典文本」的每一分每一絲文字細縫，都被歷代的解經者詳盡地審視過，並由此形成各自的理解傳統。因此「語言性」的破解，當然是貼近聖人之意的路徑，詮釋者無可迴避。而且由於經典的神聖性，使得語言文字之載體，更是分享了高度的權威性。於是，經典文字的神聖與權威使得多元並陳的可能性，恐屬不易。然而，在語言文字的落差下，分歧多元的理解卻又是詮釋的常態。是以，我們屢屢在過去的經典詮釋歷史中，看到「各執一詞」以自重的衝突，難以真正定於一尊。

另外，就經典作者與解經者的「歷史性」而言，則牽涉到「詮釋」的主體問題。狄爾泰 (Wilhelm Dilthey) 在處理人文現象時，曾提出「詮釋」

3 張鼎國從西方詮釋學發展過程中的幾個顯題化爭議，如「照原意」、「較好地理解」、「不同地理解」等議題，清晰地點出許多經典詮釋會面臨到的困境，相當值得參考。請參張鼎國，〈「較好地」還是「不同地」理解：從詮釋學論爭看經典註疏中的詮釋定位與取向問題〉，收入黃俊傑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一）：通論篇》（臺北：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1），頁 15-50。

4 詳細討論，請參黃俊傑，《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臺北：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1），〈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儒家詮釋傳統研究芻議〉，頁 20。其他相關討論同見此書，〈從儒家經典詮釋史觀點論解經者的「歷史性」及其相關問題〉、〈儒家論述中的歷史敘述與普遍原則〉。

(interpretation) 與「解說」(explanation) 的分別。認為解說關乎客觀知識的掌握，尤其著眼於自然世界之解釋，有別於以「詮釋」活動為方向的人文學，因為人文學的知識構成方式特別強調主體的涉入，所以詮釋則重於主體者的力道。此說是否合宜？由此而來的兩個「世界」與「知識」的模式，是否恰當？確實存在爭議。⁵ 不過，他指出詮釋活動有著主體性傾向，則有所見。事實上，由於經典作者或神聖作者已逝，其代表的真理世界也封存於文字之中，詮釋者的作用在於釋放此一神聖的意義，尤其是經典作者或神聖作者的心意。是故在文字之外，恐需涉及主體表現與理解的諸般問題，此時其主體的「歷史性」將影響詮釋的方向。更進一步說，經典作者或神聖作者以其主體動能展現對於真理之掌握，因此經典中的主體性問題，自然是詮釋過程中需要注意的地方。當然，詮釋者亦為一主體，並由其主體的張力影響了詮解之方向，所以詮釋與認知主體的關係當然密切。以此而言，經典詮釋更容易在詮釋主體的張力之下，產生差異。⁶ 於是，釐清經典作者與解經者的「歷史性」之影響，亦是經典詮釋的重要任務。

凡此種種，皆影響了經典詮釋的走向。回到中國經學發展的歷史上，我們看到自經典形成之後，歷代解經者無不在深信聖人之意的信仰下，參與了經典詮釋的工作。但正如前述，語言性的分歧理解自有其「文字」與「意義」之間的層次差異；而詮釋者的歷史性，又不得不讓時空的特殊條件進入詮釋活動裡，進而產生不同理解之可能。因此，中國的經典詮釋其實是在「變異」的狀態下，所建構的經學世界。此種情形，看似道術將為天下裂，無法復歸整全。實則，經典的變異詮釋出現，何嘗不可視之為知識的增長！如果說，神聖作者透過語言文字的封存，保留「真理」以待識者追蹤躡跡，那麼「真理」在解經者的灌注之下，意義的豐盈與顯豁，不正顯現真理與詮釋者共舞的樣態。

此次《漢學研究》「經解與變異」專輯來稿踴躍，經過審查收錄六篇論文。這六篇論文各有其主論的議題，但都反映了中國經典詮釋的「變異」現象。

5 相關討論，請參梅廣，〈語言科學與經典詮釋〉，收入葉國良編，《文獻及語言知識與經典詮釋的關係》（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頁 77-83。

6 相關討論，請參黃俊傑，《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儒家論述中的歷史敘述與普遍原則〉，頁 92-97。

這些論述中，或從「事」，或從「概念」，或從「方法」，甚至從「翻譯」的角度，分析了中國經學詮釋裡的「變異」，豐富了這個課題的討論。

本專輯第一篇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蔡長林副研究員的〈從對祭仲評價之轉變看公羊學「經權說」的歷史際遇〉，此篇文章主要是透過祭仲故事在歷代學者的詮解過程中，說明祭仲形象之改變，並不僅僅是由於經、注文字訓詁的差異理解，更重要的是，自唐宋代以來的「文化轉型」所使然。基本上，從祭仲「以臣廢君」一事來看，《公羊》確實是透過「經權」的視角，認為祭仲是以「權」道行事，故以正面價值評之。然而，唐宋之後的解者，卻對此一「權」道之說提出疑義，進而扭轉了漢晉經注的傳統觀點。蔡教授認為此一現象，雖然可能有漢晉唐宋的義理差異於其間，但是唐宋以來的「變革」之影響，或許也是解經者應當深加考慮之處。蔡教授此文想要說明經解的變異與時代的文化轉型有關，因此祭仲形象的改變，恐怕不是只有義理型態的不同，更在於主導義理型態轉變的時代文化價值。

第二篇為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楊儒賓教授的〈喚醒物學——北宋理學的另一面〉。楊教授近來對於中國經典中的「物理」，投以關注，此篇論文即於此一問題意識下的研究成果。在這篇論文中，楊教授注意到過去以來學界習慣以「主體性」哲學為中國哲學之主軸，因此聚焦於「心學」，卻同時忽略了「物」的傳統也是構成中國哲學的一面高峰，尤其在北宋以後的理學發展中，「心—物」關係起著重要的思想定錨的作用。是故他從北宋以來透過《中庸》、《易經》對抗佛教世界觀的作法，勾勒北宋解經者在這兩部的「性命之書」中，對於整體世界的根源性說明，才更值得我們注意。此外，楊教授也指出北宋以《中庸》、《易經》所建構的本體世界，不是靜態的本體宇宙論，而是連著工夫論的活潑世界觀，是以「觀物說」之下的工夫意義，正凸顯了「內外一如」的真實感。楊教授此文對於經典在異代之際的不同詮釋，提供了一個深入的觀察，也為我們開展出經典詮釋型塑理學發展的新視野。

第三篇為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吳國武副教授的〈朱子《詩集傳》解經體例與宋代經學新典範的成熟〉。此篇論著眼於解經體例為經典詮釋所帶來的影響，吳教授以朱子《詩集傳》為例，說明「集傳集注體」的出現，乃朱子融合古今經典詮釋體例，表現了兼該訓詁與義理之長的新模式。吳教授注意到長久以來的經典詮釋，以傳注的模式影響日後

經學發展甚鉅，其中「傳體重在傳述往聖前賢之說，而注體則已開著作之義，帶有建立個人經學體系之傾向」。此一分析，注意到經典詮釋的一個重大現象，此即經典「原意」與詮釋者理解上的落差問題。基本上，長期以來的經傳注疏傳統，似乎視經典原意之追求，為至高無上之目標。然而，在實際的詮釋過程裡，逸出原意而加入詮釋者的體會，其實難以避免。而朱子在原意與個人體會之間，透過解經模式的改變，使得詮釋的循環張力得以安頓，影響了後來的經學發展，值得關注。

第四篇為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魏月萍助理教授的〈悟道之機——晚明儒者「屢空」、「屢中」的詮釋特色〉。此篇論文以《論語》〈先進〉：「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的「屢空」與「屢中」之異解為討論對象，作者透過歷代儒者的解釋，尤其以朱子說法為重要參照點，清理晚明以來陽明學者對於這兩個概念的詮釋方向，進而點出在聖學和聖人之道的典範之下，將「屢空」與「屢中」視為聖學工夫的兩種進路，實與顏淵與子貢形象的評價相關，陽明學者的解法顯現了他們與朱子的觀點有別。此一研究，有趣地凸顯晚明儒者解釋經文時，如何在過去成說中，擷取概念資源，從而自創新說。事實上，此文涉及儒家文獻中的「概念」之清理，作者認為每一個時代的解經者，面對經典文獻時，背後當有一個儒學義理內涵的理解圖像，作為詮釋背景。而詮釋背景的不同，正是異解產生的重要原因。

第五篇為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鍋島亞朱華的〈由《大學》三綱領的詮釋探討日本江戶初期的儒學發展——以藤原惺窩治經方法為中心〉。此篇論文探討日本學者藤原惺窩儒學研究的特色，尤其從《大學》三綱領的視角，透過其治經方式的分析，比較勾勒其與林兆恩《四書標摘正義》的異同，說明他晚年在儒學的思想系譜中，除了朱子學的內涵外，亦能兼該陸王之學的特質，其實是已然有著由宋學轉明學的傾向。當然，作者並不認為以「包容」的態度，便可處理藤原惺窩的儒學觀，因為明末多元的經解環境，東傳至日本，藤原惺窩受到相當的影響。基本上，本篇論文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經典詮釋之現象，此即「異端」在中國本土的經典詮釋環境中，向來受到批判。但是在傳至日本時，藤原惺窩卻能展現一種開放多元的接受態度，並在相關說法中，發展自己的學說特色，則是經學詮釋研究的一個值得分析

的個案。

第六篇為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高級講師洪濤的〈英國漢學家韋利與《詩經》詮釋的變異——以 Waley 的〈考槃〉新解和 Granet 的民俗學說為中心〉。此篇論文以韋利 (Arthur Waley) 的〈考槃〉翻譯為軸，比較其他西方漢學家與中國傳統經學訓詁，發現在「考槃」與「寤歌」的英譯上，韋利將之譯為「drumming and dancing」與「capping songs」。並且由於這樣的翻譯，使得全詩由曠達、自適的境界轉向男女「對歌求偶」之方向。洪教授認為韋利的翻譯，雖然與傳統解法不同，但仍有其理解的來源，此即葛蘭言 (Marcel Granet) 的民俗學視野使然。基本上，本文所處理的課題是經典的翻譯問題。一般言之，翻譯必須回到文字的脈絡中，尋找適切的理解之可能。但若一字多義下，則理解者產生異解的機會，其實不少。若再計入異時異地解者的前理解有所不同，則差異當為常態。本文透過韋利的〈考槃〉翻譯，試圖追流溯源，即凸顯了此種翻譯上的問題。

以上六篇論文分別論及人物形象的變化、概念內涵的轉變、治經方法的新創、域外流傳的衍異、翻譯視角的流動，在在凸顯著經解「變異」的產生，原因多端，未可驟歸於一。當然，就經典詮釋的經驗而言，追求原初意義的客觀真實性，常是多數詮解者的主要目標，尤其在中國經典詮釋的歷史上，更是明顯。然而，依實際的詮釋過程來看，「異解」的出現反而是常態。因此，如何面對此種目的與結果相反的「異解」現象？成為歷來解經者的共同要務。事實上，本專輯所收的六篇論文，不管研究的課題為何，其分析的過程大抵涉及了經典文本「語言性」的斷裂與融合，或是主體性張力在詮釋上的擴張與突破。於是我們看到經典詮釋中的「作者」、「詮釋者」、「文本」共舞於一境，作者也好，詮釋者也罷，創作邏輯與閱讀理解的交光互影，時間與空間的視域融合，使得經典文本的文字隙縫擴大，於是我們知道：知識的增長成為可能。